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4.003

# 开放与突破

## ——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回瞻

牟方磊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密集指向以下论域: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历史分期、发展线索;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建构路径、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方法论问题;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理论基点、重要体系、重要学科、热点问题;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成绩、缺憾、最新发展; 等等。围绕以上论域, 学界在基本文献的审读、历史语境的还原、理论和文化影响因子的探寻等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之成绩体现为研究视野多样而灵活, 具有鲜明的反思性; 研究成果丰厚而扎实, 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研究范式有效而多元, 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但在研究的全息性体系性专门性、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深入挖掘、还原文献的历史语境和凸显文献当下语境的融合等方面, 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之建构研究还有待深化与拓展。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问题意识; 研究视野; 学科体系; 马列文论; 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4-0018-13

**引用格式:** 牟方磊. 开放与突破——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回瞻[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18-30.

## Openness and Break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MU Fangl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nsiv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oints to the following fields: the connotation, historical stages and development clues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path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thinking mode, discourse mode and methodology of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important system, important subjects and hot issues of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is not enough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so on. Around the above areas,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收稿日期:** 2019-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牟方磊(1984—), 男, 辽宁喀左人,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done a lot of basic work in the review of basic literature, the reduc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cultural impact factor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are reflected in the divers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e research field and the distinctive reflection. Research results are rich and solid, with a clear directi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is effective and diverse, with obvious complementarity.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be deepened and expanded in the aspects of holographic system specializatio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rest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literature and integration of highlighting the current context of literature.

**Keywords:** new era; theory of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 awareness; research horizon; subject system; Marxist-leninist theory; historical experience

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研究与反思的成果都很丰富，三者耦合纠缠，互相渗透，呈现合流趋势，很难决然区别建构史和研究史。从总体上讲，新时期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研讨日益多元化，呈现出“开放”与“突破”的时代特征。所谓“开放”，是指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挣脱旧有的极左僵化文论体系，步入发展新轨；所谓“突破”，是指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汲取古今中外优秀文论资源，面向广阔的社会文化现实，在新体系建构、新学科创建、新话题提出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发展和深化了以“人民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引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迈向自信与创新的新时代。我们从以下五大方面来梳理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研究与反思情况。

## 一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历史分期与发展线索

### （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思想的提出，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就有人批评那种用教条主义方式学习苏联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实际的做法。<sup>[1]</sup>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命题。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之提法明显来自邓小平的启发。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性、民族性、开放性、现实性、实践性、社会主义性、原创性、科学性、现代性、多样性、发展性等关

键词来界定“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若再细分，则有侧重式与综合式两种。

一是“侧重式”。或是侧重发展性，如蒋孔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光明日报》1995年9月15日）认为，对“中国特色”不要作狭隘的理解，也不要作固定的理解，而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或是侧重民族性，如冯宪光《50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认为，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在全球化现代文化知识融合的背景下，注重中国文学的本土因素和文学理论民族特性的研究，提倡和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学理论。或是侧重原创性，如汤学智《90年代文艺理论批评走向考察（续）》（《文艺评论》2000年第4期）认为，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或是侧重马克思主义性，如马龙潜《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的科学本性》（《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二是“综合式”。或是“民族性+马克思主义性+现实性+开放性+现代性”，如董学文《谈谈中国特色》（《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关于文艺理论中国特色的含义，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理论传统；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其指导原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吸收了一切外国优秀文艺学说的

最新成果的产物;“中国特色”本身应具有跻身世界理论文化前列的现代感。或是“现实性+实践性+民族性+开放性+发展性”,如杜书瀛《九十年代: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认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具有以下特点:充分表现着时代特点,与文艺实践息息相关,充满活力;充分表现着中华民族的特点;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成果,具有开放性;不断形成,不断发展。或是“马克思主义性+现代性+民族性+科学性+开放性+发展性+多样性”,如钱中文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的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sup>[2]</sup>

可将上述关键词合并为四大要素:思想资源(民族性、马克思主义性、开放性);现实基础(现实性、实践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性、社会主义性);学理特点(原创性、科学性、现代性、发展性、多样性)。学者们的界定可看作是这四大要素的不同组合,接下来的界定工作应注意:一是寻找四大要素的最佳组合式;二是将“中国特色”与其他相似概念如“民族特色”“中国化”“中国形态”的关系辨析清楚。

## (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历史分期

学者们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将20年的文艺学历程分为两期,前期(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一个从“反正”到“反思”到突破的过程,是从以往的“一统天下”走向“百家争鸣”的过程;后期(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从80年代的“年青气盛”转到90年代的“老成持重”的过程,是从“多元争胜”转而开始意识到必须“多元对话”的过程。朱立元《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将近30年的文艺学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学的批判与反思时期(1978—1984);文艺学回归自身时期(1985—1990);文艺学的综合创新时

期(90年代至2006年)。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将1978年以来的文论发展史分为突破、发展与建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是旧的受到“左”的僵化思潮严重影响的文艺学理论体系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6年,是我国文艺学全面发展阶段,其时各种新说纷纷涌现、层出不穷;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是我国文艺学逐步走上独立的理论建构时期。童庆炳将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反思时期(1978—1984年);追求文学理论自主性时期(1985—1990年);综合创新期(1991—2007年)<sup>[3]</sup>。钱中文、吴子林《新中国文学理论六十年(下)》(《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将新时期文论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0年代末,是拨乱反正、深入反思、观念变革期;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20世纪末,是文论发展的深化综合期;第三阶段是21世纪开始至2010年,是文论多样化建构和中国特色追求期。鲁枢元《“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将新时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为崛起期;20世纪90年代为转型期;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为综合期。上述学者采用的都是线性历史叙事模式,该模式具有符合大势、脉络清晰的特点,但都或多或少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比如并行、交叉、错位、倒退、歧路等情况,这些情况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亦应充分考虑。

## (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线索

“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是“发展线索”,依据不同的发展线索可做不同的历史分期。学者们从各自视角出发,梳理了该时段的文论发展线索,概言之,其依据主要有:(1)依据哲学基础的变化,如王一川《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将其归纳为:认识论、感兴论转向—言论转向—修辞论转向;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将其归纳为:主体性—主体间性;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将其归纳为:物本—人本(主体性)—主体间性(生



态整体)。(2)依据思想资源的变化,如代迅《从西化到传统: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论发展走向》(《文艺评论》1998年第4期)及《从西化到传统: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论发展走向》(《文艺评论(续)》1998年第5期)将其归纳为:西化—传统。(3)依据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变化,如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将其归纳为:中心—边缘;他律—自律;政治化—学科化。张法《语言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转型》(《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将其归纳为:政治性—学术性。(4)依据话语方式的变化,如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概说》(《中外文化与文论》2006年第1期)及《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将其归纳为:一家“专政”式的独语—“百家争鸣”式的对话;政治话语—学科的学术话语;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被其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5)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如杜书瀛、玉立《新时期文艺学反思二题》(《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将其归纳为:内转—外突。新时期文学和文艺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向内转”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兴起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等,表现出“外突”倾向。(6)依据研究范式的变化,如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3期)将其归纳为:革命—审美—解构;李衍柱《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将其归纳为:革命文艺学范式—建设文艺学范式;鲁枢元《“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将其归纳为:政治范式—审美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可将上述六种视角合并为三大类:理论资源(哲学基础、思想资源);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理论自身特点(研究重心、研究范式、话语方式)。应当承认,从三大类视角出发的线索梳理基本切合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实际,但也要看到,现有成果并未穷尽线索梳理的可能性,我们还可通过不同视角析出其他线索,如就“理论资源”看,有现实主义文论—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等;就“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有“指导—阐释—解构”等。

## 二 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建构路径与现实基础

### (一)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

理论建构绝非向壁虚构,而是要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涉及思想资源问题。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近现代文论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四大思想资源。从建构思路和建构实绩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 1. 以马列文论为底基

一是以马列文论为主导,广采博收古今中外优秀文论资源。就“建构思路”看,董学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认为,关于“体系建设,从思想资源上讲,应注意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本身的学习、探讨和开掘,另一方面应进一步解决好批判、吸收、改造、借鉴20世纪以来人类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优秀思想成果的问题。钱中文认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种高屋建瓴、宏放、综合的气度十分重要。高屋建瓴,就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去辨析各种文学理论的长短与得失,给以其实事求是的评估与地位,预示其发展的前途。所谓宏放,说的是对中外古今的文学理论不仅熟悉,而且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视野开阔,有着巨大的包容性。所谓综合,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他人的价值与局限,广泛汲取各种文学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给以改造,融会贯通地利用它们,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sup>[4]</sup>陆贵山(《对话与重构——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认为,在文化交流、交锋和交融中,我们应当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取长补短、优化组合的原则,经过批判继承,把西方现当代文论中那些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融入和重构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就“建构实绩”看,新时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如“审美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实践活动论”“文艺人学”等,都是以马列文论为主导、广采博收古今中外优秀文论资源建构而成的。

二是以经典马列文论为主导,着重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精华。王杰(《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文史哲》1993年第5期)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受三方面基本因素制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基本问题的理论把握。冯宪光认为,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从根本上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文论面临的相同问题所作的探讨也应当受到重视和借鉴。<sup>[5]</sup>钱中文《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当代文论建构浅议》(《中外文化与文论》2011年第2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本着批判与鉴别、综合与创新的方针,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有用经验,将它看作我们建设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资源。

三是以马列文论为主导,着重吸收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精华。张海明《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考》(《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思的深入,其中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童庆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认为,必须吸收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遗产,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结合点。傅腾霄(《面向廿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认为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须着重考虑三个问题:应扎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对其精髓部分,不仅需要理解,而且应当活用;要具有民族特色。汪涌豪《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认为,古代文学及文论传统也能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并有助于当代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成型与确立。

## 2. 以西方文论为底基

西方文论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建构影响巨大:某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体系以西方文论为底基建构而成,如主体论文艺学、象征论文艺学等;大量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学科以西方文论为底基进行创建,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等;中国特色文学本体论以西方文论为底基建构而成,如形式本体论、语言本体论等。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从“极大推动中国文论现代转型”“有力促进思想解放视野拓宽”“初步找到了一条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古今中外综合比较的发展道路和方法”三方面,高度评价了西方文论资源对新时期中国文论建设的重大意义。近年来,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直指现当代西方文论要害,将如何看待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这一问题推向前台,其引发的相关讨论至今未息。

## 3. 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底基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追问中国古代文论有无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南帆《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曹顺庆《中西诗学对话:现实与前景》(《当代文坛》1990年第6期)对此进行了探析。1995年,曹顺庆用“失语症”指称中国当代文论的症候,引发广泛讨论;1996年10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自此,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开始以积极姿态介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21世纪以来,以“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为旨归的专著颇多,成绩较著者有童庆炳、张少康、黄霖、曹顺庆、汪涌豪、刘明今、蒋寅、袁济喜、李春青、党圣元、古风等,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底基建构起来的文论体系有文学意象论(夏之放、叶朗)、感应诗学(郁沅)、兴辞诗学(王一川)等。代迅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做了详细回顾;黄念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勾勒了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现代转型的基本面貌,并对转型过程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作了反思;高建平等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从历史与现实、场域与语境、争论与建构、变异与反思等方面,对“中国古代



文论现代转换”做了专题研究。

#### 4. 以中国近现代文论为底基

杜书瀛《满怀信心迈向新世纪——〈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学术座谈会纪要》（《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不能忽视梁启超、王国维之后一百年来文艺学研究中的好传统、好经验。代迅《五十年回顾与前瞻：实践派美学与中国当代文论的逻辑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5期）提出，应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和融合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资源，建构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学界深刻认识到中国近现代文论资源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意义，梳理、反思的著作与文章呈井喷之势，钱中文、童庆炳、杜书瀛、王元骧、张炯、董学文、曾繁仁、高建平、谭好哲、南帆、余虹、赖大仁等皆撰有回顾反思类文章。就著作（编著）看，陈传才、殷国明、杨春时、庄锡华、杜书瀛、钱竞、黄曼君、杨春忠等梳理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史，钱中文、童庆炳、温儒敏、刘方喜、吴子林、庄锡华、钱竞等关注现代文论发展史，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包忠文、高建平、姚文放、陶东风、李慈健、王春荣等注目当代文论发展史，汤学智、陈传才、谭好哲、张婷婷、杜书瀛、朱立元、董学文、金永兵、曾繁仁等注重新时期文论发展史，权绘锦、何志钧、季水河、胡海、杨青芝、程镇海、金元浦、赵凯、李夫生等专注于中国马列文论发展史，曾繁仁聚焦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发展史，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程正民、程凯倾力于中国文论教材编撰史，蒋述卓、刘绍瑾、黄念然等侧重回顾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以上种种，皆意在总结历史，接续传统，返本开新。

#### （二）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路径

与“思想资源”密切相关的是“建构路径”的选择。汤学智《满怀信心迈向新世纪——〈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学术座谈会纪要》（《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一文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若从思想资源角度看，大体有三种研究路向：其一，马克思主义文论寻求“当代形态”；其二，中国古代文论实行“现代转换”；其三，西方现代文论“中国化”。其实还可加上第四种路向：

接续中国近现代文论传统。从宏观层面讲，立足中国文学发展现实，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导，融汇古今中西优秀文论资源，综合创新。这条路径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汤学智就认为第一种路向，即从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汲取精华，经过自我扬弃、充实和改造，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体系，可能最有希望。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进入一个新的“综合”时代，诸多文艺理论新论点，都必须通过“综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辨别，批判其谬误，吸收其合理成分。童庆炳认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要走整合的路。在整合古今中外文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与我们当代的创作实践相适应的、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整合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与当代的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sup>[6]</sup>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认为，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面对三种文化资源和传统，在此基础上，综合地吸取各种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陆贵山《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认为，应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论中那些先进的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创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微观层面讲，实现文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统一，是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如董学文《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便持此观点。

#### （三）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

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之建构，一方面固然得益于古今中西思想资源的优化组合，另

一方面,现实状况(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激发也是参与建构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实践层面还不尽人意,但重视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础,在理论与现实(尤其是文学发展现实)的结合中推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创新,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诸多学者纷纷撰文表达这一主张,如邢煦寰《最主要之点》(《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推进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怎样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遍原理和不断发展的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陆贵山《在斗争和实践中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认为,必须摆正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源”“流”关系,将关注和研究的基点和中心牢固地置放在文艺实践的基础之上。童庆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认为必须以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验作为土壤去培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能够同中国的生动的实际相结合。孙绍振、陈良运、南帆《重建文学理论是时候了》(《文艺报》2000年7月4日)一文认为,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除了在逻辑上对其加以丰富使其更加自洽以外,还要以我们的经验为基础,对其加以修正、衍生、改造,甚至颠覆。高建平《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激活旧话题,发展新话题,才能真正找到理论发展之路。张江认为,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首要一点便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sup>[7]</sup>尤西林《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困境根源于文学理论脱离文学经验的结构危机,根本出路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融合,以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经验”这一基本结构。段吉方《“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认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其基本内涵和问题性即是当代文学理论如何在现实性与实践性层面充分阐释多重叠加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现象与批评。

### 三 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思维话语方式与方法论问题

#### (一)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

理论敏感性和现实敏感性是理论创新的两大来源,二者汇聚为独特的问题意识。有感于此,很多学者撰文强调问题意识之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如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认为,在20世纪文艺学的理论变革与历史发展中,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于问题的问题。钱中文《文学理论30年:成就、格局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确立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仅关系到了解问题、研究问题,更关系到理论创新问题。文论发展史也证明了问题意识之重要,如季水河、季念《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文艺发展、理论建构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文史哲》2012年第5期)认为,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历史表明,有没有问题意识,是理论研究能否取得成就、产生影响的关键。李世涛《问题意识与文学理论的危机——危机中的文学理论之重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提出了强化问题意识的途径:强化现实关怀意识;加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以文学理论学者的学院意识为契机,寻求重建文学理论的真问题;强化文学理论的独立意识,使文论从与国外理论的攀比和附庸中解脱出来。

#### (二)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思维模式

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思维方式陈旧落后,是很难提出真问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阻碍中国文论创新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就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就提出学界要开展“中西诗学对话”,如曹顺庆《中西诗学对话:现实与前景》(《当



代文坛》1990年第6期)一文就对此作了深入论述。后来,钱中文先生在《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文学理论:在新世纪的晨曦中》(《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等文及专著《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力倡“对话的文学理论”。对此诸多学者表示认同,如童庆炳《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对话与整合》(《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谭好哲、马龙潜《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立元《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关于新世纪文艺学、美学研究突破之途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周宪《从一元到多元》(《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等论著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学界已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要取得创新,必须实现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对话的转变。就文论自身言,对话应从古与今、中与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四个向度展开;就文论生产者言,应摒弃文人相轻、唯我独尊的独白习气,营造交流对话、互助共赢的研究作风。关于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有彻底否定式超越论者、持保留态度超越论者、解构式超越论者、建构式超越论者、替代式超越论者、完善式超越论者、扬弃式超越论者等多种观点。<sup>[8]</sup>

### (三)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方式

对于话语方式的自觉反思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先从文学层面展开。黄浩《文学失语症——新小说“语言革命”批判》(《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借“运动性失语症”一语断定“新小说说话困难”,南帆《叙事话语:影响与转换》(《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则梳理了新时期伊始至90年代初大陆小说叙事话语的嬗变,夏中义《假说与失语》(《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5期)最先将“失语”一词引入文论界,但真正发生影响的则是曹顺庆的“中国文化失语症”提法。<sup>[9]</sup>1999年,王岳川《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探讨了中国大陆

学术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话语转型的外在表现和深层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话语重建”仍是学界讨论热点,关于如何重建,大致形成了三条路径:一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的重建之路。如曹顺庆,其《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提出重建的基本路径与方法是: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在对话中凸现与复苏;在广取博收中重建;在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最近其思考又有变化,其《中国古代文论建设的路径》(《福建日报》2018年5月14日)认为重建路径有以下三条:中国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论。二是以中国近现代文论为基础的重建之路。如古风撰文《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主流话语论析》(《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等,总结了20世纪中国文论话语的历史经验。近年来,他在《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一文中,在回顾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话语”研究基础上,提出文学理论“话语”创新大致可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创新是基础。三是以西方文论为基础的重建之路。如姚文放,其《关于文学理论的话语权问题》(《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认为,面对西方话语对发展中国家话语的同化趋势,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理论应取的话语策略是,使自己成为西方话语的“反话语”,即以西方话语作为言说的起点和支点,从中寻得可供进一步发挥的话题,既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又借此介入了中心话语。其他文章如《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与福柯的话语理论》(《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3期)、《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与话语更新》(《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话语转向:文学理论的历史主义归趋》(《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皆循此思路。

### (四)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问题

问题意识与思维方法能使研究者发现真问题,这涉及到研究方法问题。打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统天下,引进更切合文艺自身特点的多元方法,成为新时期文艺学方法论变



革的核心诉求。20世纪80年代文论界引进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以致当时形成新方法备受欢迎、旧方法惨遭冷落的局面。一些坚持马列方法“一元论”的资深学者如陈涌、陆梅林等撰文批评以刘再复为首的“多元论者”,而林兴宅、朱立元等则支持刘再复。这场争论的整体走势是从各执一端到辩证统一,朱立元《试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方法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何国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两文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文史哲》2012年第5期)一文提出,在一元和多元语境内,应将马克思主义中更切近文艺特性的方法如“意识形态分析”等予以发扬光大。关于新时期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有段文耀《文艺学方法论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近年来文艺学方法论探讨综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20世纪90年代有汤学智《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此做了专题讨论。近年来则有季水河《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探讨新时期引进的主要文学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比较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处。夏中义的《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表》(《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认为“1985”方法论年蕴结着百年文论思维所以会发生转型的思想史密码。朱立元、刘阳军则从争论始末、主要问题、兴起语境、反思总结四方面对新时期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做了探讨。<sup>[10]</sup>

#### 四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基点、重要体系、重要学科与热点问题

##### (一)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基点

从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初,主流的文论体系(蔡仪、以群)皆基于“唯物反映论”这一理论基点,这种“重物轻人”的架构远离文学实际。进入新时期,学界开始反思主流体系之流弊,寻

找重建基点,路径有二:一是否定重建,如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论;二是批判重建,如钱中文提出的“审美反映”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承续不同路径,借助各色思想资源,选择不同的理论基点,建构了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已有学者就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问题展开讨论,如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主张“转换”反映论,蒋培坤(《也谈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文艺研究》1988年第6期)认为应引入人本学视角或人类学本体论视角。后来,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总结道: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有“意识形态属性”起点论,“文学本质—审美反映”起点论,“人类的审美活动”起点论,“人的自由生命活动”起点论,“审美的主观形式”起点论,“感兴”或“意象”起点论,等等。他认为“实践”(“生产”)起点论似更贴近马列文艺学说的体系精神。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着重评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三大基点:唯物反映论、实践论、人学思想,顺带提及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两大基点。季水河《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实践与历史反思——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也着重评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形态建构的三大基点:生产论、人论、掌握论。

##### (二)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体系

理论基点定好后,便是体系建构。新时期至今,学者们建构了多种文论体系,较具影响的有审美意识形态论与审美反映论(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艺术生产论(董学文、何国瑞、朱立元)、艺术掌握论(狄其骢、邢煦寰、曾庆元、李益荪)、实践活动论(童庆炳、陈传才)、文艺人学(陆贵山)、审美诗学(童庆炳、王向峰、陈传才)、象征论文艺学(林兴宅、严云绶、刘锋杰)、主体论文艺学(陆贵山、畅广元)、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钱中文)、生态文艺学(鲁枢元、曾永成、曾繁仁)、

感应诗学（曾永成、郁沅）、意象诗学（夏之放、叶朗）、文化诗学（童庆炳）、兴辞诗学（王一川）、形象诗学（赵炎秋）、主体间性文艺学（杨春时）。对新时期以来文论体系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朱立元《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关系之辨析——兼与何国瑞教授商榷》（《学术月刊》1992年第8期）一文就已对审美反映论体系（钱中文、王元骧）和艺术生产论体系（何国瑞）给予较高评价。钱中文《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主要提及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审美诗学和主体论文艺学，并给予较高评价。朱立元《对反映论艺术观的历史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9年第2辑）肯定了“审美反映论”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指出其缺失。童庆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对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有较详细评述。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对新时期重要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如“艺术生产论”“文艺人学”“艺术掌握论”有较详细评述。鲁枢元《“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实践论、艺术生产论做了高度评价。前文提及的大量回顾反思性类作品，对新时期重要文论体系一般都有评述。

### （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学科

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实绩，除了体现在重要文论体系的建构上之外，还体现在大量新学科的创建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是新学科创建的勃发期，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人类学、文学符号学、文学批评学、文学叙事学、文学文体学、文学创作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价值学、文学文本学、文学言语学、文学修辞学、文学解释学、比较诗学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起步最早、成绩最大的学科应是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

文艺心理学初创于20世纪30年代，其标志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后因多种因素，几十年里这一学科发展近乎停滞。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文艺心理学开

始重建，金开诚开其源，吕俊华、滕守尧引其流，鲁枢元扬其波，童庆炳助其澜，其他重要人物有刘烜、王向峰、王先霈、劳承万、夏中义、彭立勋、周宪、李春青、陶东风、王一川等，时至今日，文艺心理学已是大学中文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对于文艺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状况，回顾、反思、展望类的文章较多，如夏中义《新潮的螺旋——新时期文艺心理学批判》（《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彭立勋《20世纪中国审美心理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刘兆吉《七十年来文艺心理学与美育心理学创建与发展概况》（《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宗波《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回顾》（《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王先霈《文艺心理学学科反思》（《云梦学刊》2010年第2期），刘锋杰《“文艺心理学”的命名之难——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学术考察之一》（《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等。

“文艺美学”学科由胡经之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胡经之的《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建构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21世纪以来，文艺美学正式进入国家学科体制，成为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分支，全国的美学研究大多归属于文艺美学学科。对于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研究文章也较多，主要围绕着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回顾、反思与展望。如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的反思》（《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童庆炳《文艺美学——新时期创立的关怀人的心灵的学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等文章。二是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如刘纲纪《关于文艺美学的思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王德胜《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王元骧《“文艺美学”之我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钱中文《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文史哲》2001年第4期）。曾



繁仁主编的《中国文艺美学学术史》(长春出版社,2010年)是国内目前唯一的文艺美学学科专史,其对文艺美学的学科发展情况做了详细梳理。

#### (四)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热点问题

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历程,可谓热点频出,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形象思维的第二次讨论、人性和人道主义论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艺学方法论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本体论论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讨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21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和文艺学学科反思、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近年的关于“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的讨论等。从20世纪末至今,就新中国成立或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思潮、文艺学学术热点,汤学智、李慈健、陈传才、谭好哲、马龙潜、陆贵山、高建平等学者,或编或著,皆有专书论述。其代表性著作是汤学智《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和高建平《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前者出版较早,重点梳理了新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十大文学热门话题:文艺与政治关系、形象思维、现实主义、现代派、寻根与文化热、文艺方法论、文学主体性、通俗文学、新写实等;后者颇具集成色彩,分上中下三编,将新中国成立至2008年几乎所有重要的文艺学热点问题囊括其中,书后所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大事记(1949—2008)”,资料详实。<sup>[1]</sup>

### 五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成绩、缺憾与最新进展

#### (一)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成绩与缺憾

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成绩,如朱立元主编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张炯的《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钱中文的《文学理论30年:成就、格局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就具体成绩而言,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就是在现代性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论自主性问题。而钱中文、童庆炳《新时期文艺学的建设与展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则从“创新意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三方面高度评价了新时期文论成绩。董学文则将新时期文论的进步归纳为四点:文学观念突破了旧有束缚;文学理论突破了单一独语模式;文学理论研究视野极大拓展;文论研究成果超过原有水准,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的、动态的、复合多样的理论形态。<sup>[12]</sup>

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缺憾,学界也有清醒认识,大家认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缺乏创新精神和问题意识。钱中文《“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3辑)认为,当代文学理论的深刻危机,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模仿照搬外国文论、缺少批判精神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缺陷导致我国当代文论缺失原创性和独创精神。季水河《百年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百年的传播与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缺乏创新精神。王岳川《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之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资本现状令人难以乐观,如文论的创新几乎成为一个梦。

#### (二)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最新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当代的文艺实践,建构了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新形态,其在《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等篇什中,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宏伟目标出发,在历史、现实、国际三重视域的融合中,充分肯定了文艺建构和引领时代风气及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文艺工作者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习近平文艺思想是近年的学术热点,文论界对其的



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关键词展开：

一是“特征”。如董学文《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文艺报》2017年8月16日）认为，习近平文艺思想极具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它携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已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化推进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阶段。李一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学习时报》2018年1月12日）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品格和特征体现为六方面：着眼历史使命；立足新的时代；秉持人民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揭示文艺规律；突出问题导向。徐粤春《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美学特征》（《文艺报》2018年6月8日）则从“劳动创造美”的本质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照亮生活”的审美观、“坚定文化自信”的艺术观四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美学特征。金永兵《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中国艺术报》2017年12月25日）从问题导向的时代性、主体自觉的中国性、全人类格局中的世界性、人民主体的价值指向性概括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

二是“内涵”。“点”的研究，如张江《重塑批评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从“尊重和遵循民族审美标准”“艺术标准高于商业标准”“文艺批评必须要有批评”三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文艺批评观的深刻内涵。张江《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求是》2015年第1期）则着重阐释了习近平“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论断的内涵与意义。党圣元《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文化与文学经典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11日）从“经典是凝练治国理政智慧的重要源泉”“经典是彰显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经典是传播民族精神的重要桥梁”三方面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文化与文学经典观。张晶《人民是文艺审美的主体——对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美学理解》（《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丁国旗《“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理论突破》（《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范玉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人民性研究》（《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王列生《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艺思想研究》（《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等文章则聚焦于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观点——“以人民为中心”。“面”的研究，如丁国旗《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治国理政视域中的文艺观研究》（《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认为，文艺工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中国传统文艺治国理念的延续，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光辉，是根据现有国情、民情、文情与时俱进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sup>[13]</sup>丁国旗《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论纲》（《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将习近平文艺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对文艺本质属性的新界定、对文艺功用的新阐释、对艺术家素养的新要求、对文艺精神价值的新期盼、关于文艺人才培养的新思路。高洪《习近平文艺思想内涵研究》（《美术研究》2018年第3期）则从“五个明确”“五点要求”“五个坚持”来理解习近平文艺思想体系的丰富内涵。

三是“比较”。赵炎秋《重视普及与呼唤精品——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分析毛泽东“延安讲话”与习近平“北京讲话”的同中之异，认为两篇讲话的基本精神都是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毛泽东重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强调普及；习近平则强调文艺精品的创造，认为这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关键。赵炎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三篇重要讲话为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4期）则重在分析毛泽东“延安讲话”、邓小平“祝词”与习近平“北京讲话”之同，认为三篇讲话虽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各自的内涵与侧重也有不同，但都与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及其话语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是“定位”。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里程碑。张玉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里程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董学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董学文《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中国文化报》2017年11月1日),蒋述卓、李石《论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董学文《习近平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等对此作了深入论述。认真消化与挖掘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贡献,探索在新的文化语境与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诸多问题,是当前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重点任务。

由上可见,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密集指向以下论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历史分期、发展线索;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建构路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方法论问题;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理论基点、重要体系、重要学科、热点问题;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成绩、缺憾、最新发展等。围绕以上论域,当代学者在基本文献审读、历史语境还原、理论和文化影响因子探寻等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概言之,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成绩主要体现为三:一是研究视野多样而灵活,具有鲜明的反思性;二是研究成果丰厚而扎实,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三是研究范式有效而多元,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另一方面,在研究的全

息性体系性专门性,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挖掘,重视中国现当代文论和文学实践之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价值,注重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的结合,注重还原文献的历史语境和凸显文献当下语境等方面,其还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

#### 参考文献:

- [1] 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J].新建设,1957(8):52.
- [2] 钱中文.文学理论30年:成就、格局与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6(5):90.
- [3] 童庆炳.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J].文艺争鸣,2009(9):18-26.
- [4] 钱中文.主导·多样·鉴别·创新[J].文学评论,1992(3):160.
- [5] 冯宪光.“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J].文学评论,1999(1):128.
- [6] 童庆炳.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对话与整合[J].文艺争鸣,1998(1):28.
- [7]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14(5):29.
- [8] 季水河.走向多元对话思维: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与思维方式的变革[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5(1):13-33.
- [9] 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东方丛刊,1995(3):215.
- [10] 朱立元,刘阳军.1985: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年的文化记忆[J].社会科学战线,2016(1):120.
- [11] 高建平.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12] 董学文.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J].高校理论战线,2008(10):58.
- [13] 丁国旗.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治国理政视域中的文艺观研究[J].文学评论,2016(5):35.

责任编辑:黄声波